

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

王 屏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

王 屏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2004 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王屏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

(日本留学博士丛书)

ISBN 7-100-03989-4

I. 近… II. 王… III. 政治思想史-日本-近代
IV. D093.1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4630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JINDAIRIBĒNDEYAXIYAZHUYI

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

王屏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民族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3989-4/K·792

2004 年 3 月第 1 版

开本 850 × 1168 1/32

2004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3 1/8

定价:22.00 元

序 一

从历史上看,日本关于东亚区域主义的研究大多从政治与经济的角度出发,而不太注重其文化意义,这是区域主义观念导入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因此,我们首先必须进行历史性的考察,即搞清区域主义观念什么时候、如何地、为什么导入,在意义上如何对其界定,并透过这些研究思考东亚区域主义的未来走向。

今天的“区域主义”(Regionalism)概念是指以超国家的广大区域为对象、以实行经济、政治或法律的组织化为目标的一种理念。但是,“区域主义”概念在 19 世纪 70 年代形成之初,它在欧洲是指各国国内的一定区域,到了 19 世纪 90 年代,这一概念才开始流行。由爱德温·R. A. 塞里格曼(Edwin R. A. Seligman)主编并于 1934 年 7 月出版的《社会科学大辞典》里有“Regionalism”这个词条,该词条由海德维格·辛茨(Hedwig Hintze)撰写。辛茨写道,“Regionalism”一词于 1874 年首次使用,19 世纪 90 年代以后,这个概念才被广泛使用。因其出现较晚,所以,它还没有一个公认的正确定义。他一边指出“区域主义”与单指各国国内的“Sectionalism”的区别以及它所包含的某种民族的因素(即文化的因素),一边大量列举法国以及其他国家国内区域主义的历史事例来进行说明。接着他还指出说,相反,近 10 年来有一种新的区域主义(即从“联邦国

2 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

家”(Bundesstaat)向“区域国家”(Regionalstaat)过渡的区域主义)倾向存在。在德国,“并非过度看重古代联邦国家的疆界,而是把在新的经济的、地理的、文化的、社会的基础之上重建德国作为目标。”这预示着在不久的将来会出现一种由国内区域主义向国际区域主义转化的趋势。

在日本,国际区域主义概念在 20 世纪 30 年代前半期兴起。1933 年 1 月,在国际联盟协会发行的杂志《国际知识》上登载了政治学者蜡山政道“重新认识世界与区域国际联盟”的论文。蜡山政道在论文中揭示了国际区域主义这一概念的含义,这是一篇具有前瞻性的论文,他主张区域主义适应当时日本所处的国际环境。该论文预测到不久的将来日本会退出国际联盟,认为到了那时日本将倡导国际区域主义,并以此作为自己所依据的国际秩序原理。蜡山在其论文中强调,日本如果退出国联,不应回到“国家主义”路线上,而应考虑遵循区域主义理念成立类似于“太平洋地区和平组织”或“国际联盟远东地区组织”这样的“新国际和平组织”(蜡山在其论文中将“Regionalism”称为“地区主义”、将“Regional”称为“地区的”,后来,当该论文收录到他的著作《世界政局与日本的世界政策》中时,这两个词分别被改成“区域主义”和“区域的”)。蜡山认为,“区域主义”是当时的日本在“国家主义”与“国际主义”之间所能做的惟一选择。蜡山将国际区域主义与作为其基础的国内区域主义相比较,认为“它好比一个国家内部的区域制度因现行的地方制度存在缺陷而必须考虑成立新的国家地方组织一样”,同时,他还断言,“正如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统一也不会发生任何变化一样,作为世界组织的区域制度也不允许其违背世界和平组

织的原理”。

然而,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引入的“区域主义”概念,在激变的国际形势中超越了修正原有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国际秩序原理,导致否定民族主义的对外军事扩张正当化以及对由此而造成的既定事实的认可,“区域主义”在其中起到了意识形态的作用。探讨 20 世纪 30~40 年代流行于日本的“区域主义”概念时,理所当然地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后半叶近代国家出现之前的固有历史前提。那时,便为形成于欧美各国的“区域主义”概念的导入做好了准备。

20 世纪 20 年代,日本采取了当时具有普遍意义的国际主义基本方针,即实行欧美先进国家主导的全球主义。当时全球主义的全球化标准是,在政治上表现为裁军,在经济上表现为金本位制。1930 年 1 月,日本恢复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停用的金本位制。紧接着又促使伦敦海军裁军条约得以成立,这一条约补充了 1922 年华盛顿海军裁军条约的不足。同时,这一系列方针政策也使 20 世纪 20 年代日本的全球主义达到顶峰。

但是,从次年即 1931 年开始,随着军部势力的兴起导致国际形势改变。原来在日本处于旁系乃至底流的“区域主义”,在仿照外国模式的同时突然成为时代的主流。“满洲事变”之后,“区域主义”作为东亚国际性事实关系正当化的新概念被广泛使用,而“满洲事变”也正是日本退出国联的原因。“区域主义”概念的使用是出于因日本退出国联而导致其在东亚丧失了实现全球主义的现实基础这一考虑。第一,它意味着对国联主导的全球主义组织的否定。第二,它被视为有别于国家主义并超越国家主义的一种新的国际秩序原理。因为依据具有普遍意义的国际法已无法说明日本

4 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

与“满洲国”之间的特殊关系。同时,“区域主义”还可以与中国的民族主义形成明显的对抗。所以,为了与中国的民族主义对峙,确立日满之间的特殊关系,所需要的原理不是国家主义,而是超越国家主义的“区域主义”。这是当时“区域主义”倡导者的考虑。第三,退出国际联盟的日本害怕陷于国际孤立,认为有必要用一个什么国际组织来取代国联。“区域主义”倡导者们似乎在取代全球性国际组织的区域性国际组织中找到了日本的生存堡垒。在“区域主义”倡导者当中,也有人主张“泛亚主义”。如“泛欧主义”倡导者利卡德·库德哈夫·卡勒吉(Richard Coudenhove-Kalergie)就依据国际秩序中的“区域主义”重组理论来说明其对亚洲的适用性。库德哈夫·卡勒吉在1931年11月的泛欧主义运动机关刊物《Pan Europa》上发表了论文“日本的门罗主义”。1932年1月,日本的国际联盟协会机关刊物《国际知识》翻译并转载了这篇论文。库德哈夫·卡勒吉在其论文中将日本的“东亚门罗主义”视为继美国的“门罗主义”、大英帝国的自决权之后的“第三门罗主义”,认为它完全可以与泛欧主义并立存在。他认为,国际联盟应该像认可美国及英国的“门罗主义”一样认可亚洲及欧洲的“门罗主义”,从而实现“区域主义”的重组。

中日战争爆发后,作为战争的目的,日本于1938年11月开始倡导“东亚新秩序”,“区域主义”成为“东亚新秩序”的理论基础。第一次近卫内阁的外相有田八郎对英国驻日大使说,为了改变中国的状况,要坚持“东亚经济圈”理论。有田所考虑的仍然是泛欧主义模式,他将“东亚新秩序”中的经济部分“东亚经济圈”视为正当的存在。另外,作为“东亚新秩序”的指导原则还可以举出“东亚

协同比主义”为例,这一理论试图在以美国为中心的美洲大陆的国际秩序中寻找“东亚新秩序”的模式。在中日战争之前,“区域主义”作为对以国联为中心的原有的国际秩序的修正原理以及补充原理而被倡导,此时,它已经不仅仅局限在个别的、局部的原理上,而是作为世界普遍性的秩序原理而存在。也就是说,在地球上如果试图对自然与文化进行有机的整合,那就必须依据“区域主义”理论,将处于均衡状态下的数个区域分开,构筑“以区域协同比为基础的世界新秩序”。欧洲的以德、意两国为中心的“欧洲新秩序”以及东亚的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新秩序”,均被定位在以“区域主义”为依据的“世界新秩序”一环的位置上。当时的“区域主义”倡导者们认为,正如“西欧的作为秩序基本要素之一的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的解除”具有“欧洲新秩序”的“革命”意义一样,通过中日战争,相同的过程也会在东亚完成。

对于“区域主义”倡导者来说,实现“东亚新秩序”的障碍有两个。一个是中国的民族主义,另一个是利用中国的民族主义并与之提携的欧美帝国主义。“区域主义”倡导者认为曾经在欧洲发挥作用的民族主义作为普遍的秩序原理已经失去了其历史作用。他们强调说民族主义之所以在非欧洲的日本取得成功是基于日本具备诸多条件这一特殊性,但民族主义却无法成为救助亚洲的原理。依据“区域主义”倡导者的观点,中华民族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超越民族的区域连衡的必要性。可是,中国的反日民族主义妨碍了这种合作,这正是日本发动中日战争的重要理由。总之,“区域主义”倡导者认为,中日战争的最终目的在于超越民族主义。

“区域主义”倡导者进而认为,与“区域主义”相对立的秩序原理除民族主义外还有“帝国主义”。本来,“帝国主义”是指欧美帝国主义。但是,“区域主义”倡导者在日本的大陆政策中也看到了“帝国主义”倾向的存在。他们认为日本有必要制定出与欧美帝国主义有所区别的大陆政策,即“建立在民族协同关系基础之上的区域命运共同体”政策。但是,在当时,“区域主义”中反帝国主义的因素远比反民族主义的因素弱,而反民族主义的因素又成为形成帝国主义的因素之一。

这样的“区域主义”意识形态最终影响到日本的国际法学。当日本在1940年倡导“大东亚新秩序”(进而倡导大东亚共荣圈)时,日本的国际法学界不仅积极响应还开始参与构筑“大东亚国际法”。那时,有两种理论模式受到重视。一个是当时纳粹德国的法学家卡尔·修米特(Carl Schmitt)所倡导的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广域国际法理论,另一个是反映在门罗主义当中的以美国为中心的美洲大陆国际法秩序。这两种理论模式揭示了“区域主义”的国际法原理,也成为日本构筑“大东亚国际法”的理论前提。

如上所述,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区域主义”是以日本的军事力量为先导的政治与经济意义上的“区域主义”,它几乎不具备文化上的意义。而“区域主义”所要排挤的民族主义其目标也主要放在军事、政治与经济方面,对于文化上的民族主义,“区域主义”显然是无能为力的。总而言之,这一时期日本主导的“区域主义”缺少文化上的基础。

由于战败,以日本为中心的“区域主义”,特别是30年代以后的“区域主义”被打上休止符。战败后的日本已经不具有独特的

“区域主义”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战败后的日本就与“区域主义”没有任何关系了。据近年来的研究显示,1945年以后的亚洲,一方面是从30年代以后的日本“区域主义”中解放出来的各种各样民族主义主张的出现,另一方面是美国取代英国、日本并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力。面对冷战局面美国开始构筑独特的“区域主义”国际秩序,并将日本定位于其中。这一构想的目的是把日本作为亚洲区域经济的中心轴,以图抑制共产主义,特别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发展,从而创造出亚洲独特的国际秩序。具体地说,就是把重点放在重建和增强日本的工业能力上,将日本与作为原料基地和市场的亚洲其他地区连接起来,使除社会主义国家以外的亚洲地区这一“垂直的国际分工”体系发挥其职能。而美国也因此减轻其过重的财政负担并实现其建立能够对抗共产主义的稳固的区域体制。毋庸置疑,在1948年前后对日占领政策开始转换的背景下,美国的所作所为都体现了这一亚洲区域主义构想。

但是,美国战后所推行的作为冷战一环的亚洲“区域主义”,其防共意识形态和以日本为中心的“垂直的国际分工”构想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日本曾推行过的“区域主义”(“大东亚新秩序”、“大东亚共荣圈”)。因此,美国的做法不可避免地会与亚洲各国的民族主义(特别是那些想通过走独立工业化道路来摆脱殖民地化的经济民族主义)产生冲突。如当年韩国李承晚政权的反日民族主义就是其中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

众所周知,20世纪60~70年代,支撑美国亚洲“区域主义”构想的条件发生了迅速的变化。第一,亚洲的冷战(特别是中美冷战)结束了。1972年尼克松访华,其后经过一番周折中美于1979

年实现了关系正常化。毋庸赘言,此间,中国恢复了其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因此,原有的亚洲区域主义至少失去了其作为冷战战略的意义。第二,由于冷战的结束,原来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地区也开始被卷入全球主义的浪潮中。曾经作为应对冷战的政治、经济战略而发挥作用的“区域主义”,在冷战结束后被视为应对全球主义的区域性共同课题。第三,亚洲的反对霸权国家推行“区域主义”的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以其经济实力作为后盾已经几乎不可能被纳入到美国所构想的以日本为中心的“垂直的国际分工”体系之中。这样,亚洲各国便从战前的地区霸权国家日本、战后的世界霸权国家美国所推行的“区域主义”当中解放出来,并试图摸索一种以相互对等为前提、以“水平式整合”为目标的新的“区域主义”。这样的历史经验在亚洲还是首次出现,而在新的历史阶段研究“区域主义”这一课题,其侧重点应在文化方面。

竹山道雄在其《缅甸的竖琴》中描写了这样一个场面:决心留在当地的上等兵水岛一身僧侣打扮站在收容所的栅栏外,偷偷地目送因战败第二天就要从缅甸回国的日本士兵。士兵们合着竖琴的伴奏声齐唱“简陋的小屋”,依依惜别。音乐的旋律取自一首苏格兰民谣“敬仰”。据说,作者当初是想找到一首传统的、能在包括缅甸的亚洲地区广为流行的曲子,但结果没找到合适的。最后,只好使用一首缅甸原宗主国创作并被收进日本《小学生歌曲集》当中的一首曲子。因为在缅甸与日本之间还没有一首通唱的歌曲。这种情况还不仅仅限于缅甸与日本之间,自古以来就有着密切关系的中日两国之间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竹山说,在当时,中日之间也很难找到一首能共同欣赏的歌曲。

由于当时亚洲还不存在跨越国境的音乐文化,因此,人们怀疑亚洲是否存在与“欧洲文化”相同的“亚洲文化”。杰出的思想史学家津田左右吉著有《支那思想与日本》(1938年)一书,他通过政治思想、道德思想、宗教、文学等领域的比较,否定了中日文化的同一性(进而也否定了“东方文化”这一概念存在的合理性),他认为,日本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更具共同性。这种观点否定了当时日本政府提出的作为中日战争目的的“东亚新秩序”理念,因而遭到强烈反对。但是,如果从学术的角度看还是具有一定说服力的。

然而,尽管许多历史事实显示出过去“亚洲文化”的稀薄特点,但是,它决不意味着今天我们把“亚洲文化”作为研究课题没有意义。特别是对于日本来说,“亚洲”决不单单是一个地理概念。亚洲近邻各国的舆论、经济动向对今天的日本所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一点每个日本人都有深切的感受。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亚洲”对于日本人来说是一个与生活现实密切相关的概念。这一点对中国来说也一样。“文化”就产生在这样的生活现实中。津田左右吉作为思想史学家,他所重视的东西便是这种与生活现实紧密相连的“思想”以及作为构成这种“思想”要素的“文化”。亚洲也曾存在过这样统一的生活现实。但是,这样的生活现实只存在于前近代的中华帝国、近代以后的欧洲以及日本等各殖民帝国、冷战体制下的美国与苏联以及这些霸权国家所奉行的垂直交往方式当中。在这种状况下,无法产生基于各成员国之间相互平等的横向交往文化。通用的歌曲就是这种“文化”的象征。现在流行于亚洲(特别是中日韩三国)青年之间的通唱歌曲也许就是“亚洲文化”终于具有了实质性内容的一个象征。

王屏博士的著作《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在追溯日本“区域主义”产生的历史前提以及直至“大东亚共荣圈”意识形态消亡的各个阶段变化的历史渊源并对其进行精细分析的同时，总结了由此而产生的历史教训。另外，本书还对 21 世纪亚洲“区域主义”的走向进行了展望。该博士以翔实的资料为依据，对与帝国主义密不可分的日本的“区域主义”进行了学术分析与论证。指出了其不仅给日本近邻各国、同时也给日本自身带来巨大灾难的原因所在，与此同时，还探讨了摆脱帝国主义束缚的日本“区域主义”新的可能性。王屏博士的著作使人感到，这是中国新生代学者率先参与创新“亚洲文化”的先兆之一。

三谷太一郎

2003 年 5 月 1 日

序 二

我首先对王屏教授的著作《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即将出版表示由衷的敬意。再具体点说,我对她集中精力研究和捕捉反映“亚细亚主义”历史全貌的资料、从正面切入毁誉褒贬不一的“亚细亚主义”这一主题并进行学术性研究而做出的努力表示敬意。因为“亚细亚主义”发展的历史背景及其过程非常复杂,尤其是对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所揭示的那种悲惨的历史做学术性的规范研究更是相当困难。本书由于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其特色是从政治思想史的角度出发,将亚细亚主义分为:(1)作为“思想”的亚细亚主义;(2)作为“行动”的亚细亚主义;(3)作为“外交战略”的亚细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并将此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运用思想史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的理论分析框架及学术方法论分别对其进行分析。同时,将“亚细亚主义”作为亚洲区域主义的一个否定的典型事例,在对其进行批判的前提下,根据追寻历史性的观点以及相关时代人物的观点来尝试对其理论结构进行更加内在式的分析,这是胜过外在式批判的一种极为重要的方法。

王屏教授的著作《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具有以下4个特征。

第一,本书系统地洞察了自19世纪中叶的明治时代开始到

1945年为止的这段长期历史。对于尝试在一以贯之的视野下观察整个近代激烈变动的历史这一研究方法我想给予高度的评价。

第二,本书将外交的、政策的、军事的,即作为历史现实而表现出来的亚细亚主义与作为理念、意识形态的亚细亚主义明确地区分开来,并试图在相关时代的社会思潮中对后者进行定位和加以正确地分析。

第三,作为基本论点,本书对近代日本亚细亚主义发展历史的深层文化因素进行了探讨,指出了位于东西文明交汇处的日本其目的合理性过强、价值合理性缺乏的文化特征是导致近代日本亚细亚主义悲剧性结局的根本原因。

第四,本书将亚细亚主义作为与现代相关联的历史性区域主义的一种形态来加以把握,并将其提升到一般性的现代课题,即引导出一个具有历史共时性的课题。由此,具有历史局限性的“亚细亚主义”便升华为更能面向未来的一个研究课题。

另外,本书博采众长,对相关时代的相关人物及其有关亚细亚主义研究的文献资料进行仔细阅读并予以时代性定位。这是一种扎扎实实的研究方法,它既是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基本特征,同时也是历史实证性研究所使用的方法。对此应给予充分的肯定,我确信这种研究方法会使本书的价值进一步提高。

近代日本亚细亚主义与国家主义、国粹主义以及狭隘的民族主义相结合,使过去一个世纪的历史发生了什么变化,它给亚洲民众带来了怎样的痛苦与灾难,对此,我们有无法忘却的痛苦体验。而这种历史悲剧又是不能随着时间而忘却的一种体验。正因为如此,将亚细亚主义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作为思想史研究的对象,

甚至在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文化的广泛领域里作为综合研究的对象而加以深入探讨该有多么重要！我认为这不仅仅是追问国家战争责任的日本学者的研究课题，同时，它也是东亚地区学者站在各种角度加以探讨的课题。本书作为这种先驱性的研究著作得以出版，使我们更加深切地期待着今后能有更多的相关研究出现。同时，也预祝王屏教授的研究取得更大的进展。

下面就近年来所关心的问题以及在今后的历史研究课题中与亚细亚主义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问题，从目前全球化进程中所显现出来的新的历史研究课题的角度谈一些看法。

首先，必须从多元的、不同的角度来探讨亚细亚主义、大亚细亚主义问题。如，地政学、海洋论、国家国体论、区域理论等（Prasenjit Duara, *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lanham, 2003）。

其次，作为历史背景，日本的近代化在 19 世纪后半叶即明治时代前期已经不仅仅是欧洲与亚洲之间的所谓东西关系了，我们应从东亚或世界规模的视野来探讨近代化这个课题。

最后，如果从几百年东亚地区长期发展史这一研究课题看，在较长的时期内，区域变动中也存在着类似区域合作的要素。因此，追溯亚细亚主义的渊源也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也就是说，在观察广大的东亚地区区域史时，有必要从前近代与近代的历史连续性这一视角出发。

1. 全球化时代区域社会现象重新出现及其区域文化

近年来的历史认识有一种从空间认识与文化地理的主体性认

识出发的新倾向。即,在空间认识上从全球视野出发来探讨亚洲观问题;在文化地理的主体性认识上,有豪兰德(Hawland)以及巴顿对日本在东亚社会的文化空间中被边缘化的重新定位。另外,孙歌提出有必要从更长期以及空间认识的连续性角度来追述日本亚洲观的源流。这些观点与到目前为止的在亚洲对欧洲这一框架中研究日本的亚洲观、日本论、近代论不同,它在全球的范围内积极地为亚洲定位并以全球视角看东亚社会,它为在亚洲对亚洲的结构布局中重新探讨以往的研究成果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Daniel Dorling and David Fairbairn, *Mapping: Ways of Representing the World*, Longman, 1997, 伊豫谷登士翁、酒井直树、テッサ・モリス＝スズキ 编《グローバリゼーションのなかのアジア——カルチュラル・スタディーズの現在》未来社 1998 年版)。

与此同时,在人们强烈主张全球化的过程中,对于全球化内容的看法也渐渐地出现分歧。如果把全球化分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三个领域的话,经济领域特别是处于前沿的金融成为全球化的最典型部分(Larry Sawers, Daniel Schydrowsky, David Nickerson eds., *Emerging Financial Markets in the Global Economy*, World Scientific, 2000)。金融工程学所导出的法则和衍生金融商品的方程式作为资本产生资本的结构“完成”了金融市场的全球化(Rasiah Gengatharen, *Derivatives Law and Regulatio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1, Alfred Steinherr, *Derivatives: The Wild Beast of Finance*, John Wiley & Sons, Ltd., 1998)。

另外,在社会文化方面也充分地显示出全球化的动向。由于信息化的飞速发展,任何人都可以获得社会文化信息。所不同的